

□中国史研究: 晚清民国史专题

清季的历史教科书与线性历史观的构建

李帆

【摘要】清季,伴随新学制、新学堂的建立,各类教科书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基础教育领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历史教科书也不例外。较之中国悠久的传统史学著述,历史教科书这一具有新体裁、新功能的历史撰述,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其中线性历史观的凸显,就是特色之一。线性历史观在当时历史教科书中的表现可谓多种多样,如历史分期中的线性时间观、直线发展的进化史观、单线的历史因果论、民族国家叙事的历史目的论,等等。探讨线性历史观何以呈现于教科书,固然离不开其时西学笼罩的整体学术氛围,离不开日本学者所编教科书之历史观念的影响和中国“新史学”运动的作用,但也不能忽略对中国史学传统中固有的线性历史观因素的考索。

【关键词】清季; 历史教科书; 线性历史观

【收稿日期】2014-10-15

【DOI】10.15939/j.jujss.2015.02.012

【作者简介】李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教授,《史学史研究》副主编,历史学博士。(北京 100875)

近些年来,清季的历史教科书^①较为学者关注,出现了一批具有学术水平的研究论著。^②这些论著对历史教科书做了不同角度的探讨,其中也不乏对教科书中呈现出的历史分期、进化史观等进行研究的内容,这已涉及线性历史观方面的分析。但线性历史观关联的范围较广,进化史观仅是其基本内容之一,已有的研究尚未整体揭示出线性历史观是如何体现于历史教科书的,这颇令人遗憾。进而言之,从总体上研讨清季线性历史观的论著实则也不多见。^③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以清季国人自编的本国史教科书为核心,做一点初步探讨。

① 清季,教科书的应用范围主要在刚刚兴建的各类中小学,所以本文所言历史教科书是指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以及一些适用于社会教育领域的教科书。

② 如李孝迁《新旧之争:晚清中国历史教科书》,《东南学术》2007年第4期;李孝迁《晚清中小学国史教科书述论》,《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第5期;舒习龙《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编纂思想析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张越《近代新式中国史撰述的开端——论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形式与特点》,《南开学报》2008年第4期;刘超《古代与近代的表述:中国历史分期研究——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中心》,《人文杂志》2009年第4期;刘超《民族主义与中国历史书写——清末民国时期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复旦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较近的研究则有Peter Zarrow. *Discipline and Narrative: Chinese History Textbook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Q. Edward Wang. *Narrating the Nation: Meiji Historiography, New History Textbooks, and the Disciplinarization of History in China*. In Brian Moloughney and Peter Zarrow Edited. *Transforming History: The Making of a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等等。

③ 近年来比较有影响的论文是王汎森《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以社会进化论为中心的讨论》,《新史学》第19卷第2期,2008年6月; Wang Fan-sen. *The Impact of the Linear Model of History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Brian Moloughney and Peter Zarrow Edited. *Transforming History: The Making of a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历史教科书是近代分科之学的产物，以“教科书”形态进行历史撰述在中国始于19世纪末，最先由来华西方传教士开始。传统中国社会虽然也有一些蒙童读物，但与近代意义上的教科书有本质区别。历史教科书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则是在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新学制以后。这是由于新学制下的历史教科书是学校历史教育的主导资源，是一般民众普遍历史观的主要来源，其编写反映了国家政府、学者等对历史资源的态度，特别是政府所代表的官方的态度，所以不能不受到各方高度重视。

所谓线性历史观，主要是指线性文明发展理论，源于基督教的历史观。基督教史学最早把历史理解为一个由固定的起点（上帝创世）到终点（末日审判）的直线运动，指出历史是一种向着既定目标前进的运动。启蒙思想家从内容上进行了更新：以理性取代神性，以科学取代迷信，以线性取代轮回，以进步破除天定。这样的线性历史观对18世纪以后的欧洲史学和文明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历史和文明的发展过程一直被看成是一种由低向高直至理想世界的直线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线性历史观开始在中国大行其道，影响到思想、学术的各个方面，历史教育则首当其冲。无论是学堂章程还是教科书，只要是与历史教育相关者都有线性历史观的影子。

1904年初清政府颁行《奏定学堂章程》，它是在借鉴日本中小学课程基础上制定并实施的。根据章程所定学制，小学教育（含初等小学与高等小学）为9年，中学教育为5年，总共14年，都设置历史课程。对于初等小学的“历史”课，《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其要义在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1]23}。对于高等小学的“中国历史”课，《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其要义在陈述黄帝尧舜以来历朝治乱兴衰大略，俾知古今世界之变迁，邻国日多、新器日广；尤宜多讲本朝仁政，俾知列圣德泽之深厚，以养成国民自强之志气，忠爱之性情”^{[1]33}。对于中学的“历史”课，《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先讲中国史，当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暨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次则讲古今忠良贤哲之事迹，以及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弛张、政治之沿革、农工商业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凡教历史者，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1]42}。在西式中小学教育体系刚在中国得以确立的清季，《奏定学堂章程》等于教育的基本法规，当时虽然还没有“课程标准”的提法^①，但《章程》中对历史课程“要义”的规定，实际就起着“课程标准”的作用，也是编写历史教科书所应遵循的规范。而从这些规定来看，“线性历史观”的一些含义已体现其中。众所周知，在线性历史观中，线性发展观和因果关系是主要内容。上述《章程》都要求历史课程需讲“由来”、“变迁”、“隆替”、“沿革”、“进境”等，《奏定中学堂章程》更直接规定“凡教历史者，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这些表述所强调的都是线性发展或因果关系在历史课程和历史教育中的重要性。《章程》里虽然也提及了历史上的王朝更替和圣主贤君，但显然王朝更替的固有历史观不及线性发展观和因果关系为人瞩目。线性历史观也强调历史发展的目的性，《章程》规定讲授历史要使学生明了“本朝列圣德政”，同时要“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或“养成国民自强之志气”。这里所言讲授或学习历史的目的虽然与强调历史发展目的的线性历史观不能完全等同，但内在精神是相通的。明了“本朝列圣德政”，自然是作为国家政权的清政府对历史教育提出的基本要求，而更关键者则在于反复提及的“国民”字样，明显含有

① 按“课程标准”在国家政府教育文件中的出现，是在民国初年。

塑造“国民”的用意与民族国家叙事的线性历史目的论相接近,有助于线性历史目的论的传播。

《奏定学堂章程》对历史课程的规定,实际起着“课程标准”的作用。这也就意味着,依据《章程》所编撰的官修教科书,其内容必有线性历史观的体现。揆诸此类教科书的实际,也恰恰如此。与此同时,私撰历史教科书也在各类学堂流行。所以如此,是由于清政府虽规定对教科书采取审定制度,但却力不从心,于是又不得不规定“如有各省文士能遵照官发目录编成合用者,亦准呈送学务大臣鉴定,一体行用,予以版权,准著书人自行印售,以资鼓励”^{[2]509}。由此开启了私家编撰历史教科书的局面。于是,在一段时期里,呈现出了官修与私撰竞争并存,而又以私撰历史教科书为主的教科书流通局面。相较官修教科书,私撰历史教科书更少束缚,更贴近时代脉搏和史学潮流。在线性历史观已然成为学界新宠的清季,私撰历史教科书在内容上对其有更多的反映。可以说,构建线性历史观,是当时历史教科书的普遍行为。但同时也要指出,其背后的关怀实际颇不相同。具体而言,官修教科书依《章程》而撰,其所体现的线性历史观绝不违拗当局意志和现行秩序;而私撰历史教科书多为或持维新改良立场、或持革命立场者所编,编写者的政治立场使得其历史观念必然与当局有所疏离。这是需予以说明的。

二

在清季的历史教科书中,线性历史观的主要层面如线性时间观、线性发展观、线性因果关系、线性历史目的论等,都在不同方式下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在中国古代的史书中,最常见的纪年方式是帝王纪年,其次为干支纪年。帝王纪年以皇帝年号为准,基本上是每个帝王自为一个断限(有的帝王也在执政中途改元易号),每个王朝为一个时间单位;干支纪年则六十年一个轮回,最能充分体现古人的循环史观。显然,这两种纪年方式均与线性历史观无缘。而能打破王朝界限和循环历史观念、代表线性时间观的纪年方式则为自西徂东的公元纪年,它是把历史理解为一个由固定的起点到终点的直线运动之基督教史学时间观的体现。清季国人所编的本国史教科书中,已开始使用公元纪年。如丁保书编《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未附有《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以中历、公历对照的方式,将公元前551年(周灵王二十一年)孔子诞生到公元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俄英法向清政府租借旅顺大连湾、威海卫、广州湾的历史大事,按年列出。^{[3]《附表》1-5}如此列法,打破了帝王纪年和干支纪年对于历史的某种阻断,使从古至今两千余年的中国历史进程可以一目了然,线性历史得以呈现。公元纪年外,清季还有其他一些纪年方式,如黄帝纪年、孔子纪年等,大体皆效仿公元纪年而设计,只不过将耶稣诞生作为时间起点换成了黄帝或孔子诞生为起点。教科书采用这样的纪年方式,同样能体现线性历史的精神。如横阳翼天氏(曾鲲化)的《中国历史》在谈及纪年时说“纪年为记录考证所最不可缺之符号,然中国向例,以帝王为标准,或一年而屡变,或一人而数易,繁难不便,极为野蛮。今因孔子为我国历史中第一代表人物,用其诞生之年为纪元,孔子以前,则由一二逆数递推,以期划一而省读者之脑力。”^{[4]《中国历史内容要点》2}该书将中国固有的帝王纪年视为“野蛮”现象,而以孔子纪年取代之,固然有“省读者之脑力”的考虑,恐怕也有将类似公元纪年的孔子纪年视为“进步”现象的考虑,而其产生的结果却是使历史书写能在线性时间点上通而贯之,可以让读者由此改变原来的历史视野,超出王朝的局限来理解历史演进的全貌。

与纪年紧密相关的线性历史时间问题是有关历史分期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历史分期是西方普遍历史的产物,史家通过划分历史时段来认识历史进程,表现对历史的理解。^[5]清季历史教科书大多都有明确的历史分期,将中国历史划分为若干个时段,用“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等词汇来表述。如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将中国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

段；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也是如此；横阳翼天氏《中国历史》将中国史划分为大（太）古、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前世、现世七个阶段；姚祖义《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仅将中国史分为上古、中古两阶段，等等。历史阶段的划分，表面上仅是时间断限，实际蕴涵着从古至今单线发展的线性时间观。这些时段划分在上古史方面大体一致，除个别者外，基本是将秦统一之前的历史作为上古史；对于中古史和近古史，有的教科书将秦到明末皆视为中古史，有的以唐宋之际或五代之时为界，分为两期，将秦到唐宋之际或五代的历史视为中古史，将唐宋之际或五代到明末的历史视为近古史（也有将宋到清末的历史都称为近古史的）；对于清代历史，有的教科书将其归入近世史，有的将其划入“最近代史”^①。之所以要有历史分期，横阳翼天氏明确指出“中国历史旧例，只区朝代而无时代之分，此蔽读史者之智识、塞读史者之感情之大端也。今综览古今世运之大势、民族之盛衰、社会之变动，分为诸时代，使读史者面目一新”^{[4]3}。夏曾佑则详细阐发了何以要分中国历史为上古、中古、近古三大时期以及三大时期内部还要具体划分时段的缘由，强调以每个时期的时代特点及演化为基本依托，特别强调“世运”的变化。如言“近古之世，可分为二期。五季、宋、元、明为退化之期，因此期中，教殖荒芜，风俗凌替，兵力、财力逐渐摧颓，渐有不能独立之象。……清代二百六十一年为更化之期，此期前半，学问、政治集秦以来之大成，后半世局人心，开秦以来所未有。此盖处秦人成局之已穷，而将转入他局者，故谓之更化期”^{[6]12}。也就是说，划分历史时期，是依据由古至今的历史发展进程和不同时段的特点而定，注重的是时序演进中的发展与变化，与线性历史观的精神完全一致。

通过历史分期表现历史演进，实际隐含着如何看待历史演进的史观问题。清季历史教科书的编者热衷于将上古、中古、近古、近世这类在西方带有发展内涵的时段概念，套用在中国历史上，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他们服膺当时最为流行的史学观念——进化史观。不论是官修教科书的编者，还是私撰教科书的编者，也不论是趋于保守一边的，还是趋于维新、革命的，大抵皆受进化观念的影响，而在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中多有体现。此一问题多为当今学者关注，现有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毋庸赘述。这里仅举数例说明之。丁保书认为“历史者，叙过去进化之现象，为未来进化之引线，非仅纪三千年之事实已也。”^{[3]《编辑大意》1}其编《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即依此理念行事。汪荣宝认为“历史之要义，在于钩稽人类之陈迹，以发见其进化之次第，务令首尾相贯，因果毕呈。晚近历史之得渐成为科学者，其道由此。”^{[7]1}他编撰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史》就是贯穿自身主张之作。刘师培在所编《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凡例”中表明，要将“社会进化之阶级”作为要点，且说“今所编各课，于征引中国典籍外，复参考西籍，兼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8]2177}。甚至连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历史教科书广告都以讲“进化”作为招徕。如对吕瑞廷、赵澄璧的《新体中国历史》加以介绍的广告词说“是编体例，仿东西洋历史最新之式，夹叙夹议，断制谨严。每卷末详举制度、学术、宗教、风俗、技艺、产业诸门，以见文明进化之序。”^{[9]版权页}可见，进化史观几乎成了历史教科书共同遵守的观念。而讲求从野蛮到文明、从落后到进步直线发展的进化史观，则是最典型的线性历史观。

讲求进化史观，也意味着必然要关注历史演进的因果关系，因进化论下的历史书写是一种单线因果论性质的书写。在清季，这方面例证也很多。如横阳翼天氏认为“古今社会事物，无巨细鸿纤，皆有原因结果二大关键。……是故读历史学，不究其原因，察其结果，则不明事实之关系。不明事实之关系，则虽读尽古今史乘，诚所谓记诵词章，无裨社会。”基于此，他指出中国

^① 如章铤所编《中学中华历史教科书》将从五代到明末的历史视为“近代史”，将清代历史视为“最近代史”。见章铤：《中学中华历史教科书》下册，文明书局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三年（1908-1911）版。

“洎秦汉而降，进化之度极迟，虽谓中国人气质，有是古非今、尊中贱外、保守照例、傲慢自大等病，然其最大之原因，未始非沉沦于专制政治之黑暗时代，而结成此腐败不堪之秽果也”^{[4]2-3}。即把秦汉建立大一统国家后中国社会发展进化缓慢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专制政治之黑暗”。汪荣宝也认为“夫人类之进化，既必有其累代一贯之关系，则历史亦不能于彼此之间，划然有所分割。然或因一事变起，而有足使当时大势面目一新者，史家为便编述计，特据此类事变，以为标准，而区分时代焉。”^{[7]1-2}他强调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和因果关系，将历史时代的区分归结为历史发展的因果性质。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则在这些方面更为突出。商务印书馆在为该书所刊广告中言“其宗旨则在发明今日社会之本原，故于宗教、政治、学术、风俗古今递变之所以然，志之独详。”^{[9]版权页}该书特色确实在此。夏曾佑非常注重历史发展的线性因果联系，如他强调人类由渔猎社会进入游牧社会，再由游牧社会进入耕稼社会，前因后果相随，单线演化而日趋文明，乃“今日文明之国”上古时代的历史发展公例，“天下万国，其进化之级，莫不由此，而期有长短”^{[6]17}。这样的表达，是典型的进化论观念下的单线因果关系的历史书写。

线性历史书写还有很强的目的论色彩。前已言及，《奏定学堂章程》对历史“要义”的规定，已明显含有塑造“国民”的用意，与民族国家叙事的线性历史目的论相接近。实际上，在各派人士所编的历史教科书中，不仅非常重视塑造“国民”，而且鉴于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对民族主义的倡导也不遗余力。如夏曾佑把自己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怀融进所编教科书中，指出“智莫大于知来，来所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即学习历史的目的，是“据往事而知未来”，认为当时“人事将变”，欲知前途之夷险，不能不亟于读史。^{[6]3}正是依据这样的宗旨和目的，其《中国历史教科书》才重在记载“民智”进化的过程，突出“国民”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揭示历史发展不同阶段国民的文化状况。实际是在国家濒于危亡境地之时，欲通过历史教育，激发国人的国民意识和爱国心。较之夏曾佑教科书的相对隐晦，有的教科书则直截了当触及民族主义目标。如《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在“编辑大意”中说，该书要“识古来并合之由，以起近今丧亡之痛，长学识，雪国耻”，“以卫种族、张国威为主，凡遇有卫我同种、力捍外侮者，必称道勿衰，以壮我幼年之气”。^{[3]《编辑大意》1-2}横阳翼天氏在阐发其编《中国历史》的缘由时说“今欲振发国民精神，则必先破坏有史以来之万种腐败范围，别树光华雄美之新历史旗帜，以为我国民族主义之先锋。”^{[4]2}这样的表达，充分显示出历史教科书不同于一般史学著作，线性历史目的论和教育功能是其必有的追求。当然，也需指出，尽管教科书都强调历史书写的目的是塑造“国民”、培养“爱国心”和达成民族主义，突出的是民族国家叙事的线性历史目的论，但官修教科书要塑造的是有“忠君卫道”之心的“爱国”“国民”，而持革命或维新改良立场者所私撰的历史教科书，则或是依托于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或是依托于在既有体制下实现开明政治以救国的理想，其所要塑造的“国民”和所培养的“爱国心”自然与官修教科书不同。亦即线性历史目的论方面的民族国家叙事可能用词相同，但指向相异。

这一时期国人自编的历史教科书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在体裁上打破了旧有史学形式，大多采用综合叙述的章节体。采用章节体，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学校历史教育的需要，因中国史学固有体裁不便于近代教育，更不便于表达编写者的历史观念，就像汪荣宝之所言“纪传之属，详于状个人，而疏于谈群治；编年之作，便于检日月，而难于寻始终。要之事实散漫，略无系统，可以为史料，不可以为历史”^{[7]1}。而西方传入的章节体可谓既综合又单一，相较于传统体裁，既适于近代教育之用，又能表达历史教科书编者“谈群治”、“寻始终”的理想。对于线性历史观的构建和线性史观的表达而言，此种既综合又单一、便于“寻始终”的体裁，当然是最方便的，这恐怕也是当时线性历史观能在历史书写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辅助因素。

三

正是通过教科书编者的历史书写,通过他们对线性时间观、线性发展观、线性因果关系、线性历史目的论在书写中的刻意表达,线性历史观在清季的历史教科书中得以系统构建。那么,何以这样的历史观会受到如此青睐,以至于成为我们学习和认识历史的基础呢?探究起来,恐怕缘于彼时的时代环境和学者的主观追求因素为多。

众所周知,清季正是西学全面影响中国学术、中西学术相互碰撞并交融互释的时代,中国史学首当其冲,面临更新与发展的难题。严复等人积极介绍以进化史观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对社会各界形成巨大冲击,史界亦不例外,而且进化史观逐渐得到史家的广泛认同;梁启超大力倡导“史界革命”,主张清算中国“旧史学”,建立“新史学”,从史学观念、史学内容到史学方法,意欲朝向西方,全面更新,并在史界产生强大共鸣。应该说,从严复到梁启超,他们在史学上努力和更新的方向,皆是与线性历史观的主张高度一致的。与此同时,近代教育所需的历史教科书走上时代舞台。在国人自编教科书被大量采用之前,先是拿来或翻译日本现成的教科书,作为本国史和外国史教科书采用,如那珂通世《支那通史》、桑原鹭藏《东洋史要》等。作为教科书,这些史著在学术性上不一定十分高明。但引入它们,意义颇大。因为对中国史界而言,这些教科书多采用新史体例,以新眼光、新学识来编纂中国历史,所以重要的不是它们所提供的具体历史史实,而是“史识”,即贯穿在教科书中的讲求时代分期、社会进化、因果联系等典型的线性历史观念。对中国史家而言,编撰历史教科书首先是个模仿过程,而模仿的对象当然主要是日本同类教科书。在这个意义上,国人自编的本国史教科书充斥着线性历史观的因素,实属理所当然,更何况对当时教科书编者影响甚大的进化史观和“新史学”潮流亦是主张线性历史观的呢!

从本质上讲,历史教科书以线性史观为圭臬,其实体现了当时史家对“普遍历史”的热烈追求。所谓“普遍历史”,大体是指将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理解为一致的发展过程的历史。克罗齐曾指出“‘普遍史’也不是一种具体的活动或事实而是一种‘主张’……普遍史确乎想画出一幅人类所发生过的全部事情的图景,从它在地球上的起源直到此时此刻为止。事实上,它要从事物的起源或创世写起,直到世界的末日为止,因为否则就不成其为真正的普遍了。”^{[10]39} 据此,“普遍历史”的观念实与线性历史观的基本理念是一致的,源于基督教历史观的线性历史观即把历史理解为一个由固定的起点到终点的直线运动,强调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和一致性。而克罗齐在书中所举的“普遍史”的例证,也同样属于线性历史的典范,就是基督教史家奥古斯丁的作品。晚清以降的中国,知识群体的观念也在不断更新,融入“世界”成为国际平等一员的想法与呼声已相当普遍,史学界也不例外。不论是梁启超这样的史学大师,还是历史教科书的普通编者,皆存以史经世的意愿,即在历史书写中具有摆脱本土“特殊历史”而走向“普遍历史”的强烈诉求,故在历史分期、历史观念、历史体裁等各个方面皆力求靠近西方或日本人引致的“普遍历史”的范型,教科书不过是较为突出的读物而已。线性历史观也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突显出来的。

有关“普遍历史”在晚清被纳入中国学者视野以及清季日本因素的影响和梁启超等人对之的倡导,已有学者做过较为成熟的研究。^{[11]236-264} 需要补充的是,在中国固有的语境中,“普遍历史”并不完全是个新鲜事物。中国史学很早就有通贯性的历史思维,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态度所完成的《史记》,树立起古代的通史典范。在“天下中国”即等于“世界”的那个时代,以《史记》等为代表的历史撰述,就是时人心目中的“普遍历史”。在线性历史书写中至关重要的历史阶段划分问题,中国史书中也不乏相关资源。《商君书·开塞篇》以“上

世”、“中世”、“下世”的概念，总结大约相当于西周、春秋、战国三个阶段的历史。《韩非子·五蠹》中亦有“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当今之世”的表述；而《春秋公羊传》所持的“三世说”，则更为清季学者广泛知晓。当然，这样的时段划分与线性历史书写中的历史时代区分是迥然有别的，就像傅斯年所指出的，古代中国史家实际上仍然是“仅知朝代之辩，不解时期之殊”^[12]。不过尽管如此，毕竟“普遍历史”或线性历史的一些表面要素中国史家并不陌生，甚至“普遍历史”或线性历史的一些概念译为中文后的词汇表达也与中国史书所用的词汇相同，于是，中国史家具备了顺利接受“普遍历史”或线性历史的概念、原则并在史学撰述中运用的前提条件。清季历史教科书的编者史学素养颇高，熟知中国史学底蕴，能将公羊三世说之类的学说和进化史观有机结合，从而较为自如地在教科书中构建出了线性历史观。

由于教科书是民众普遍知识的基本来源之一，承担着常识构建的使命，所以它的主张的影响力绝非普通知识读物可比。作为民众普遍历史观来源的载体，清季历史教科书所主张和表达的线性历史观无论对当时还是对后世，都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可以说，我们所习以为常的历史概念、历史分期、看待历史的方式以及对历史发展的理解、对历史目的的评价，等等，大体皆缘于百年前被构建的这种线性历史观。不过时至今日，在肯定线性历史观下的大量历史著述为我们带来丰富历史视野和历史认识的同时，这种历史观本身所具有的某些根深蒂固的弊端也非常值得警惕。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说历史是进化的轨迹……以这样的定义回去看历史上的现象，往往有意无意之间会要求得一个单线进化的痕迹，要在其中寻找‘公理’、‘公例’，而忽略了历史现象中非常复杂的面相，或忽略了古人对‘史’其实具有另外一种很丰富、很有意义的看法。在对历史的新定义流行之后，这些看法被摆落一旁。”^①应该说，这样的提醒恰逢其时。

[参考文献]

- [1] 课程教材研究所编 《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课程（教学）计划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
- [2] 璩鑫圭、唐良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
- [3] 丁保书 《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上海：文明书局，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 [4] 横阳翼天氏 《中国历史》，东京：东新社，孔子纪元二千四百五十五年（1904年）。
- [5] 赵轶峰 《历史分期的概念与历史编纂学的实践》，《史学集刊》，2001年4期。
- [6] 夏曾佑 《中国古代史》（即《中国历史教科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 [7] 汪荣宝 《中国历史教科书》（原名《本朝史讲义》），上海：商务印书馆，宣统元年（1909年）。
- [8] 刘师培 《中国历史教科书》，钱玄同等编《刘申叔先生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 [9] 陈庆年 《中国历史教科书》，上海：商务印书馆，宣统元年（1909年）。
- [10] 贝奈戴托·克罗齐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 [11] 章清 《“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之书写》，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 [12] 傅斯年 《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4月17-23日。

[责任编辑：刘文山]

① 王汎森 《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第3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美国学者杜赞奇也指出，线性历史和民族历史叙事的结合，对于历史真相进而对于真理起了“遮蔽”作用。他主张用复线的历史观以及叙述话语来书写历史，用以还原历史的多样性。见杜赞奇著、王宪明等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and corporate profits.

Keywords: social marketing concept; excess product function; customer requirements; enterprise strateg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olitical Ideal vs. Confusing Reality

WANG Kai-xi (87)

Abstract: The Wuchang Uprisi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ere the greatest historical events in the Chinese history. However,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Xinhai Revolution and the early state of the ROC, some selfish revolutionaries who desired for power were so disappointing and Dr. Sun Yat-sen also acted differently from what he had preached and claimed about his political ideal. Every scholar has his own understanding and different views for this historical issue. Such confusing social reality and political phenomenon seems to be in lack of convincing explanation, which does not only apply to the past revolutionary party but also remain to perplex the contemporary scholars. The same issue shall remain unsolved to the future scholars. Mankind can't predic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but the only objective and truth are the historical events themselves.

Keywords: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olitical ideality; confusing social reality;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xplicable vs. inexplicable characteristics

“Little Court” in the Forbidden City:

Its Political History

LIU Ping, SUN Fang (95)

Abstract: Since the 1911 Revolution, the abdicated imperial family of the Qing Dynasty had set up a little court of the Qing Dynasty within the Forbidden City, which had been active for 12 years. Between 1912 and 1924, the little court, as a miniature political entity of the great empire, still maintained a series of predigested institutions that carried out many different functions of a royal palace. Meanwhile, it stayed in contact rather complicatedly with the society outside the Forbidden City. It not only aimed at resuming the throne as its mission, but also performed other political functions such as internal management, seeking for external alliance and striving for its legitimacy. The little court manifested its legitimacy to the public by organizing the funeral of Empress Longyu and wedding ceremony of Emperor Puyi.

Keywords: little court of Puyi; abdicated imperial family; the Forbidden City; Republican government

The History Textbook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inear Historical Ide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 Fan (106)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education system and a new school, all kinds of textbooks including history textbooks started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y works, the history textbooks, which are new genres and have new functions of historical narration, had some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linear historical ideal was one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The linear historical idea had been realized in the history textbooks in a variety of aspects such as the linear division of the historical stages, the linear historical view of evolution, the one-way causal-effect historical theory and the historical teleology of nation-state narrative. Why was the linear historical idea realized in the textbooks? The reasons are many. Major ones include the dominance of western studies in the academia at that time, the influence of Japanese historical ideas in their history textbooks and the impact of Chinese “new histor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esides, linear historical idea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y also counts.

Key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history textbooks; linear historical idea